

论中东地区伊斯兰复兴运动的经济根源

詹家峰 张金荣

(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 政治理论教研室, 河北 石家庄 050084)

摘要: 伊斯兰复兴运动作为一种政治运动同其他社会运动和思潮一样, 有着深刻的历史与现实根源。究其产生和发展的缘由, 更要从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层面加以分析, 而在影响其产生发展的诸多因素中, 经济因素可谓最为直接, 也最为鲜明。翻开中东地区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发展史, 我们不难看出这样的结论: 经济原因是其产生发展的最为根本的因素。

关键词: 伊斯兰复兴运动; 中东; 经济根源

中图分类号: B96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0292(2001)05-0044-06

一、厚重的民族积淀

阿拉伯半岛是欧亚非三大洲的交通枢纽, 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一地区自然资源丰富, 素有“石油海洋”之称。海湾地区自石油开采以来, 也一直是西方世界的“经济生命线”, 因该地区在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方面的重要性, 所以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素来把这一地区作为逐鹿场。

伊斯兰教的发展史,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斗争史。伊斯兰文明在首次与西方文明发生接触时, 由于当时伊斯兰文明发育完满, 具有完整框架、体系和机能, 因饱和和平衡, 它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大幅度吸纳处于低一层次的文明要素。但自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以后, 双方的境况发生了质的变化, 基督教西方对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国家展开了咄咄逼人的攻势。欧洲殖民主义者从人力和资源上对这些国家和地区进行了疯狂的掠夺。

一战后, 奥斯曼帝国彻底崩溃, 除土耳其外, 整个中东地区完全沦为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与托管地。同时, 中东社会的发展也完全被纳入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导致了中东地区传统社会变迁进程的中断。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秩序遭到破坏, 经济呈现畸形化发展, 单一种植盛行, 除埃及、伊朗个别国家外, 几乎没有工业。

二战后, 中东国家在争取政治独立的过程中, 也积极争取经济的发展, 但畸形的经济结构并没有彻底改变。虽然石油美元可以通过向外出口石油获得, 但工业的发展并不会因资金的积累而成比例地发展。阿曼、利比亚、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联酋、伊朗、伊拉克、巴林、卡塔尔等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虽然在4000美元以上, 但石油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 如果排除石油资源因素, 这类国家的社会经济综合发展状况仍停留在相当原始的水平。许多产油国连国内所需的大部分粮食和日用消费品都要从国外进口。那些中下低收入国家均以农牧业及采矿业为经济主体, 出口的多为初级产品。这些国家的技术水平较低, 生产力落后, 在经济建设中对西方国家的工业品和科学技术有相当大的依赖性。同时, 由于西方国家现代化水平相对较高, 对资源的消耗量较大,

收稿日期: 2001-02-26

作者简介: 詹家峰(1968-), 河北南皮县人, 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政治理论教研室讲师;

张金荣(1968-), 女, 河北南皮县人, 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政治理论教研室讲师。

在石油替代煤炭作为动力能源之后,西方国家对石油的需求量加大,石油的出口市场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多年积累下来的石油美元需要寻求巨大的投资场所。虽然中东一些石油国也曾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和贷款,但资金的主要流向还是发达国家。因此,中东国家对西方发达国家具有相当的依赖关系。

对西方发达国家的这种依赖关系,为西方发达国家向这些国家转嫁经济危机提供了便利,减少了中东一些国家的经济稳定系数。197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经济危机,国际市场上石油价格下跌和美元贬值严重影响了中东一些国家的经济,在经济增长非常缓慢的情况下,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的外贸赤字、通货膨胀、外债和失业方面的情况日益恶化。西方国家对阿拉伯半岛积年的侵略、掠夺、剥削、控制,使阿拉伯民族产生了一种心理定势:西方打断了伊斯兰文明的自然发展线,无论是东方大国,还是西方列强,没有哪一个国家会真心实意地帮助阿拉伯民族发展经济;只有摆脱与消除西方的一切影响,恢复被践踏的伊斯兰法规,巩固宗教传统才是求生之路。

二、经济现代化与阶级基础构筑的失衡

中东地区各个国家在进行现代化的过程中,都选择趋向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但在这些国家中,要么是封建地主阶级执掌国家政权,要么是君主总揽全局,而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资产阶级力量却相对软弱,在国内影响力小,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的作用不大。

从世界范围来看,任何一个国家在进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无一不是积极培养一支为自己政治服务的、力量比较强大的阶级队伍。但中东地区国家在选择资本主义道路与进行现代化的过程中,由于旧的社会平衡被破坏,新的平衡尚未形成,相对来说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还不成熟,更没有形成一支强大的资产阶级队伍,因而,当本国政府推行经济战略或经济政策出现失误,导致社会上下反对呼声加大,甚至反对运动走向高潮之时,便成为“孤家寡人”,政权岌岌可危,乃至大权旁落。

我们知道,在中东地区,伊朗算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现较早的国家,早在19世纪下半叶,伊朗就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工业的萌芽。但在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伊朗资本主义这棵幼苗历经沧桑,发展相当缓慢。20世纪初,礼萨王推翻了恺加王朝,建立了巴列维王朝。王朝的更迭,只是王权的转移,但其统治基础和统治制度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革。礼萨王为了巩固地主的土地占有制度,公布了不少有关土地问题的法律。1928年和1929年的《土地登记法》与《民法》正式承认土地私有制,把地主掠夺和购买的土地以法律形式确定归地主所有。1930年和1934年,伊朗又先后公布法律,允许出租和出售国有土地,加强地主阶级的经济地位,从而使封建统治制度的阶级基础更为牢固。据统计,伊朗全国可耕地50%属于1000家大地主,20%属于宗教界,10%属于王室和国家,20%属于中小地主和自耕农¹。

巴列维执政时期,从60年代开始积极推行以“白色革命”为中心内容的土地改革。巴列维虽然采取了诸如由国家赎买一部分地主的土地,然后再卖给农民或成立资本主义农场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但封建生产关系并没有完全瓦解。据有关资料显示,到1972年共有250万农户分得土地,但33%的农民仍然没有土地^④。农民即使获得土地也因无法偿还购买土地的款项以及无法承担用水、耕畜和种子的费用,不能负担对土地进行投资的包袱,而不得不重新出卖土地,沦为贫民。巴列维的土地改革计划,触及了世俗大地主的封建地产所有制以及宗教上层拥有土地的特权,因此,遭到了这两个阶层成员的顽强抵制。巴列维王朝对农业进行的一系列社会经济改革,未能建立起资本主义农业。另一方面,伊朗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在西方列强和国内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加之本身存在的资金缺乏、技术落后等因素,发展迟缓。尽管1963年以后特别是70年代后,伊朗的民族资本发展迅速(与1962年相比,1978年私营部门的投资增加了250%),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巴列维王室控制着关系伊朗国计民生的关键部门和行业(国内汽车工业的35%、银行保险业的62%、纺织业的40%、建筑业的42%和炼钢业的55%),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空间狭窄。伊朗民族资产阶级的增长与发展主要依靠国家资本的赠予、补贴和低息贷款等,其依附性很强。

与伊朗的情况相类似,在中东地区的一些国家中,随着石油经济的繁荣,资本主义因素有了长足的发展,但这些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也比较软弱。从总体上来说,它们与君主王室、达官贵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形成了一种“藤”与“树”的关系,如沙特大商人法拉昂的父亲是已故费萨尔国王的首席顾问,以军火代理商起家的沙特大商人哈绍吉三兄弟的父亲是国王的御医;也有弃政经商,摇身一变成了资本家的官僚,如原负责阿联酋的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的阿卜杜勒·纳赛尔于1977年离职创办了自己的多样化近海公司;王室贵族中的一些成员也利用手中的权力以及自身所具有的便利条件建立和发展了不同于一般私人资本主义的家族资本主义,如沙特已故国王费萨尔的长子握有沙特阿拉伯农业与牛奶公司75%的股份,沙特利雅得市长在沙特与黎巴嫩的中东银行和阿拉伯半岛的承包与投资公司中都握有股份,沙特内政大臣的儿子是国民钢管公司的主要股东,阿联酋的哈马伊角和沙

迦的统治家族成员分别开办了阿拉伯海岸银行和沙迦国民银行,阿曼著名的经营运输以及民用建筑、商业等多种业务的哈姆丹集团是该国苏丹家族的成员,等等,这些人也逐步演变成了资产阶级化的贵族。这种官商一体、工商一体的特殊现象,充分说明了两者之间联系的紧密,而这正是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力量还很软弱的标志。

与中东各国的资产阶级状况相反,各国的中下层反对力量却比较强大。首先,“中产阶级”伴随着石油美元的滚滚而来以及现代教育的发展而逐步形成、壮大和发展。这一阶级主要包括企业层管理人员、工程师以及教师、新闻工作者、高级职员等等。他们的政治动员程度、参与意识有了很大的提高,他们虽能参加现代经济但却身处政治边缘。随着经济地位的提高和对外来思想的吸收,他们日益要求改变被排斥在社会政治生活之外的被动局面,争取与本阶层相符的权力——这也是伊斯兰复兴运动领导成员知识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其次,各国最大的反对力量来自社会下层。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民众一般经济收入低,常常为生活所困;政治权力小,往往处于边缘化的境地,他们对此深表不满。再次,相对来说,中东国家地广人稀,人口密度较小,妇女走出家门工作又受伊斯兰教的约束;而近年来,大规模开采石油和发展民族经济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中东国家不得不大量吸引外国移民,以支援本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据统计,沙特阿拉伯人口的30%、卡塔尔人口的60%、阿联酋人口的67%为外国移民^(四)。虽然这些外国移民在中东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他们在居住国地位低下,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他们迫切要求改变现状。

总之,中东地区各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与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各国的经济现代化没有强大的政治、阶级基础的支持,反而产生了力量不可低估的反对派,这种“空中楼阁”似的政权缺乏稳定而强大的支持力量作后盾,张力有余,向心力不足,潜伏着导致社会动荡的“基因”。

三、经济发展模式与社会心理之间的碰撞

在20世纪20~50年代期间,对中东最有影响力的世俗化政治思潮主要有四大流派:土耳其的凯末尔主义、埃及的纳赛尔主义、伊拉克—叙利亚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主义、突尼斯的布尔吉巴主义。二次大战前后,独立的各中东国家在寻找摆脱贫穷与屈辱的过程中,往往以这四种思潮为指导思想,建立世俗化政体,并引进了西方的发展模式,在国家发展中取得了程度不同的成就。但到了70年代尤其是70年代末期,中东一些国家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多年积聚的矛盾和冲突日趋激化与明朗化。面对汹涌澎湃的现代化潮流,一些国家不能迅速构筑起促进本国经济继续发展的模式,不能及时有效地处理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难题——经济危机(经济失调、财政赤字、通货膨胀、失业率高),而是过分强调仿效与照搬西方强国经验,一味追求城市化,但城市化不能解决人们的切身利益问题,致使民怨沸腾。这些国家在走城市化道路时,面对诸多限制因素。首先,技术落后。虽然到了20世纪70年代,科技革命已经发生了三次,但任何一次科技革命的成就难以在中东一些国家得到推广、普及和应用,广大下层民众一直延续着祖祖辈辈保留下来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要么是从事“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效率低下的农业耕作,要么是过着“临水濒草而居”的游牧生活。由于生产率低,农畜产品不仅不能满足国内居民的需求,不得不花费巨额资金从国外进口粮食。70年代,伊朗过分重工轻农,对农业投资不足。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投资仅为总投资的6.6%,且得不到保证,农业生产持续低迷,粮食不能自给。1978年,伊朗国内生产的小麦还不到需要量的80%,大米还不及需要量的一半。沙特阿拉伯虽然粮食已能自给,但生产成本过高,国家用于农业补贴的负担太重。其他海湾各国农产品进口的比重也很大。其次,中东阿拉伯国家的民族精神趋向保守。独特的地理位置养育了阿拉伯民族孤独的性格。孤独使阿拉伯民族对外部刺激具有极强的敏感性,一旦有外来文明(尤其是西方文明)的渗透和进入,伊斯兰文明的同质性和群体的自我亲近感倍增,对外来文明提出的挑战往往以伊斯兰文化价值观为判断标准,或全盘否定,或全盘接受,很难给予升华和中和。

阿拉伯民族的民族心理不仅与地理位置相关,而且与岛内环境相联。阿拉伯半岛大部分地区属于热带、亚热带沙漠气候。夏季炎热干燥,降水量少,年平均降水量不足200毫米,有的地方甚至几年不降一滴雨。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曼等国由于降水很少,地面没有河流,被称为“无流国”。降水量的稀少,致使阿拉伯半岛沙漠广阔,土地贫瘠,森林覆盖率低,灌溉面积狭小,常有沙暴、干热风等自然灾害。阿拉伯人的沙漠生活是单调的、划一的。他们在平时要饱受水源缺乏、天气炎热、道路不明、食物匮乏的煎熬。阿拉伯人这种特殊的生存环境和单调而困苦的沙漠生活深深地震撼着阿拉伯民族的心灵,在他们的心态中形成了对自然威力无可奈何的宿命论以及幻灭感、压抑感和危机感,他们只得在宗教中寻求解脱,用“彼世”的美满生活来慰藉心灵。特殊的生存环境造就了阿拉伯民族坚韧、耐劳的性格,这种性格容易使人被动地适应环境,遇事习惯于向内“反求诸己”、“反省自责”。

此外,城乡差距大。城乡自然过渡的基本桥梁没有建立起来,传统的封闭型的社会经济结构还没有打破,市场经济也没有取代农业自然经济,农村的劳动力没有获得彻底解放。但中东一些国家却置本国客观条件于不顾,盲

目走西方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所经历的城市化道路,并且不切合实际地希望本国在十余年的时间中完成西方半个多世纪完成的任务。1985年,科威特、阿联酋的人口城市化率就已分别达到79%和92%,沙特阿拉伯、约旦、摩洛哥、巴林也达42%~72%。面对这种外激型而非内生型的城市化道路,下层居民有一种抵触心理,而进城之后面临的窘境更让他们难以接受:一些国家的劳动力市场狭窄,涌入城市的农民由于没有多少文化,没有接受过专门的技能训练,所以,当他们出卖土地,步入城市后,面临的是失业;由于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进度比城市化的速度迟缓,住房不能满足需求,进城后的农民无处安身,只得数人挤在一间小屋中,甚至露宿街头。面对突如其来的、来势凶猛的城市化浪潮,许多人缺乏思想准备,没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这就为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奠定了群众基础。

四、经济发展战略的盲目追求与社会预期的矛盾

在中东的许多伊斯兰国家中,经济完全依赖石油资源,西方学者将其称之为“食利经济”国家。70年代初的石油提价,为中东产油国赢得了丰厚的资金,创造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但机遇往往与挑战并存,一些国家没有根据本国国情制定出长远的发展目标与规划,在白白浪费了大量宝贵资金的同时,也造成了经济结构的失衡。在这一点上,伊朗可谓是典型国家。

“七十年代揭开了伊朗石油工业的新篇章。对于伊朗来说,石油是一种吉祥和灾难的混合物。”^{1/4} 伊朗公主的这段话,从一个侧面点出了巴列维王朝面对滚滚而来的石油美元,由于没有制定符合本国国情的经济发展战略而导致垮台的缘由。

70年代初,伊朗的石油收入从原来的每年40亿美元增加到1974年的200多亿美元,上涨4倍多。面对迅速膨胀的经济实力,巴列维王朝的伊朗是“一个没有高度发达的基础设施和人才去使用与管理这源源而来的资金的国家”,伊朗遇到了“那些突然富起来的阿拉伯邻国所遇到的越来越大的痛苦”,伊朗上层似乎被新的石油收入制造的虚假的安全感所迷惑,更被石油美元冲昏了头脑,自以为石油美元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甚至认为可以进口伊朗所需要的一切,并自以为是地认为“在十年或十五年内,伊朗要完全摆脱落后状态,成为像日本和西德那样的繁荣昌盛的现代化国家”^{1/2}。这种急功近利、狂妄自大的心理,在现实生活中则表现为异想天开。伊朗公主阿什拉芙·巴列维举出了一个事例,从一定意义上道出了当时伊朗上层“闭门造车”式的制定政策的过程。“有一次召开计划会议,会上我们讨论了为有工作的母亲的孩子办日托托儿所的问题。因为瑞典的日托托儿所条件最好、最先进,于是我们打算按照瑞典的模式办日托托儿所。有人提出我们该买什么样的带栏杆的儿童床,讨论每一张这样的床得有多大的阳台面积’。我听后吓了一跳,原来我们做的是荒唐的事,我说:‘我们讨论起带栏杆的小床和阳台面积来了,可我们的孩子以前从来没有睡过这种床,他们习惯和父母、兄弟、姐妹一起睡在地板上。我们为这些孩子制造了一个外国的环境,势必会给他们带来新的问题。’讨论的结果我们建了一个新的、现代化的托儿所,孩子们每人睡一张铺在地板上的舒适的床垫。”^{1/4}在漫无目的、野心勃勃而又缺乏周密安排的经济政策的驱使下,巴列维王朝“随心所欲”。首先,伊朗政府为追求高速度(巴列维将在1973年3月至1978年3月实施的第五个五年计划中的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由11%提高到25%,预算从20亿美元增加到500亿美元)而盲目投资,建设战线越拉越长。由于伊朗的基础设施不能满足政府要求,巴列维王朝便把目光投向了国外,大肆签订贸易协定。在这方面,美国分得的“蛋糕”最大,它获得了从原子能发电、化工、农业机械、食品加工、电子工业、冶金机械、汽车制造、木材加工到医院、公寓、港口、电话通信等建设项目,总金额高达150亿美元的为期5年的贸易协定。“伊朗每年进口贸易的1/5来自美国,美国每年从伊朗获得各种收入约为60亿美元。”^⑧前苏联在这场贸易战中也大受其益。苏伊签订了一项价值达30亿美元的贸易协定,用于在前苏联境内合资兴建大型造纸联合企业以及扩建伊斯法罕钢铁厂和修建地下粮仓、重型机器厂等。伊朗还耗巨资从法国等国订购了几十座原子能发电站,其理论根据就是,巴列维预测25年后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将会枯竭,必须加紧研究对策,以防不测。其次,不顾伊朗是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国情,在国内资金相当紧张的情况下,大举向国外提供经济援助。除了将30亿美元送给意大利厂商摆脱资金紧张的困境外,还积极向其他国家发放贷款,仅给予美国的贷款就达15亿美元。不仅如此,巴列维国王还花巨资购买大量武器,以圆其“军事强国”之梦。据统计,1975年后,伊朗每年仅向外国购买武器就耗资100亿美元,占石油收入的一半。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统计资料,1976年伊朗输入的武器已占第三世界输入武器总值的23%,伊朗平均每人负担军费230美元,超过本国农村人均收入的一半多。巴列维王朝无选择地盲目引进、购买外国的机器设备,却对国内的基础设施建设重视不够,投资力度不大,港口、码头、铁路和公路等交通运输远远跟不上需要,造成了伊朗的港口堵塞,船只卸货要等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1976年,由于延误卸货,政府付了4亿美元的罚款。由于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与现实相脱节,伊朗的基础设施、农业、公用事业、科技文化、卫生等部门由于拨款严

重不足,发展缓慢,以致伊朗失去了发展机遇。

中东一些国家与伊朗巴列维王朝时期的经济状况大抵相仿,面对迅速膨胀的石油美元,也没有制定出符合本国国情的保证各经济部门平衡发展的经济战略和经济政策。这些国家所犯下的一个“通病”就是对农业重视不够,投资不大,致使农业的发展远远落后于重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1979年海湾各君主国的农业产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2%~2.7%,约旦和摩洛哥分别为8.3%和18%。^①各国政府制定的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在某种程度上为国民描绘了美好的前景,但纸上谈兵并不是现实。当人们尤其是下层民众发现政府允诺大于兑现,自己的希望破灭,特别是社会上层漫无节制地乱花钱而引发严重通货膨胀,生活水平急剧恶化,切身利益得不到满足反而受到巨大伤害之时,愤怒与怨恨就会在社会基层油然而生。

五、社会分配体制与伊斯兰教的背离

在中东经济发展过程中,伴随着石油美元的滚滚而来,虽然各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得到迅速提高(1979年阿联酋的人均产值达到14420美元,沙特阿拉伯为4980美元,约旦为1200美元^②),但在这繁荣的背后却掩藏着危机。这些国家没有建立起合理的分配体制,造成了贫富两极分化,这种不合理的分配体制也违背了伊斯兰教实现社会公正平等的基本经济思想原则。

在沙特阿拉伯,20世纪60年代后所进行的现代化改革取得了巨大成效,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但是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也产生了明显的负效应——出现了极度的两极分化。在沙特阿拉伯经济飞速发展之时,1973年爆发了十月战争。阿拉伯产油国纷纷拿起石油武器,与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大国进行斗争,在这场石油战中,沙特阿拉伯石油收入猛增,随着石油美元滚滚而来,由于没有合理的分配机制,社会上出现了两极分化,财富大部分被沙特王室及新兴资产阶级所鲸吞。据有关资料统计,70年代中期,沙特家族一年就从国家预算中支出3亿美元,沙特王室的5000名亲王每人每月可从王国石油收入中得到6万美元以上的俸禄,17000名王室成员可得到数十亿美元的补贴。他们不仅在政府中享受极高的俸禄,而且还运用手中的权力获取财富,他们或是把土地卖给政府,或是代理政府在与外国商务公司来往中获取巨大的好处。除了王室成员聚敛财富之外,沙特的一些新兴资产阶级利用与沙特家族千丝万缕的联系,大发横财。他们经营的企业享受政府的许多优惠待遇:免除他们的税收,在商品价格和利润上不受任何限制,企业在遇到困难时,国家以较高的价格买进或为其弥补赤字,政府的这些措施,使得国家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这些新兴阶层的腰包。上层的富有和中间阶层的繁荣与大部分居民的贫困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拥有少量土地或没有土地的农民、拥有少量资产或一无所有的半牧民与小手工业者,肩负着社会的资本主义变化所带来的一些重担,他们的生活水平与国家收入的增加相去甚远,粮食和工业品的进口使很多人破产,成为无产阶级的一部分,特别是居住在东方省占全国人口10%的什叶派穆斯林,虽在东方省石油企业中起重要作用,但所得的石油收入却微乎其微,这种日益发展的社会两极分化,使越来越多的沙特下层人民群众感到了伊斯兰清教主义和沉溺于奢华之中的有产者的生活方式之间日益加深的鸿沟,他们把现实中的不平等现象与《古兰经》中的平等正义、乐善好施等理想相对比,更激起了他们的不满情绪;下层人民群众的苦难进一步增加了宗教的吸引力,贫富两极分化为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提供了机会。

在埃及,萨达特执政时期经济上在石油美元的支持下,完全抛弃了纳赛尔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积极推行“开放”政策。在这项政策中获利最大的是与权力集团关系密切的少数投机家,他们从外国投资的浪潮中得到极大好处,大发横财,形成了新的百万富翁阶层,并且越来越富有;而广大中下层人民实际生活水平反而下降,导致整个社会贫富悬殊加剧。例如,1980年占全国人口20%的收入最低居民的收入只相当于国民收入的5%,而占全国人口5%的收入最高的居民的收入竟达20%^③。另外,开放政策增加了消费性生产,导致了严重的腐败现象,扩大了收入分配上的差距,深化了贫富差别的鸿沟。

在伊朗,1973年石油收入的巨增为统治阶级谋取了最大福祉。仅占全国人口1%的王室成员、大官僚和大资产阶级巧取豪夺、中饱私囊,却占有80%的财富。据1980年7月29日《金融时报》报道,1973年到1978年间,每年20亿美元的出口收入有一半落入王族手中^④。他们利用这些财富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国王花费14亿美元巨款为自己建造陵墓,在自己的专用飞机上设置了金厕所。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下层人民穷困潦倒,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伊朗公主在其回忆录中对此有这样的描述:“德黑兰出现了耗资几百万美元的摩天大楼,新生的百万富翁的住宅区华屋别墅鳞次栉比,林阴大道上高级轿车往来如梭。另一方面,我们还有许多人住在人迹罕至的偏僻山村,城市的穷人也仍然住在贫民窟里,全家人挤在一两个房间里,有的还没有电和自来水。”^⑤国内贫富差距在加大以及达官贵人们的过度消费,引起了广大穆斯林的强烈不满。“从心理上讲,今天的穷人与四五十年以前的穷人是不一样的,后者是宿命论者,认为严酷的现实也许是命中注定的,他们天生穷,而别人天生富。现在的穷人可不安分,

他们急于想从新的繁荣中分享更多的好处,很容易受那些向他们许诺‘更多好处’的人的煽动,成为激进分子。”¹³ 处于社会边缘的政治地位低、经济收入少的中下层居民,强烈要求改变现实的窘境。虽然伊斯兰教没有提供解决现代社会问题的完整方案,但经过现代思想家的重新阐释,对被剥夺参与机会的社会中下层群众而言,伊斯兰教仍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号召力,他们很容易成为伊斯兰复兴运动的社会基础。

六、石油美元的推波助澜

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迅猛发展与部分国家拥有巨额的石油收入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正是这些巨额的石油美元才为某些国家的伊斯兰复兴运动提供了宝贵的资金来源。

60年代以来,伴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中东伊斯兰国家开始摆脱殖民枷锁,大举推行石油国有化政策,收回控制在西方手中的石油主权。随着中东伊斯兰国家石油资源的开发,巨额石油美元使中东伊斯兰国家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地位迅速提高,并为伊斯兰教的复兴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1979年伊斯兰国家的石油产量为9.9亿吨,占世界石油产量的45%,1981年伊斯兰国家的石油产量超过10亿吨,占世界石油产量的35%,其中沙特一国的产量占世界石油产量的17%。1974~1979年,仅阿拉伯世界的石油收入就达5000亿美元,其中沙特一国的石油收入达2000亿美元¹⁴,石油收入为伊斯兰教的传播与复兴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源。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巨额石油美元收入,为这些国家官方伊斯兰教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部分伊斯兰国家也正是依靠石油美元,大规模地修建清真寺,出版各类宗教书籍,举办各种宗教礼仪活动和宗教节日庆典,配备先进的交通、通信设施和宣传工具扩大伊斯兰教的影响,为其他伊斯兰国家复兴伊斯兰教提供经济援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发展。石油美元在伊斯兰复兴运动中的作用诚如美国学者米歇尔·卡提斯所言:“伊斯兰教的复兴与来源于伊斯兰国家石油生产的巨额财富是密切相关的。”¹⁵

总之,经济是政治、文化的基础,要深入探讨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深刻根源,从经济方面入手是应有之义。在现在和将来中东国家进行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注意处理好现代化与继承传统文化的关系,寻找现代化与伊斯兰教的关节点,探索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之路。

注释:

¹ ① 11 陈嘉厚主编:《现代伊斯兰主义》第35、269、311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
④ 彭树智主编:《二十世纪中东史》第258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
④ 金宜久主编:《当代伊斯兰教》第32页,东方出版社,1995年。
¹⁴ ¹⁵ ④ 12 13 [伊朗]阿什拉芙·巴列维:《伊朗公主回忆录》第177、178、178~179、179、179页,新华出版社,1984年。
⑧ 魏燕慎:《伊朗动荡的经济背景分析》,《世界经济》1979年第1期。
(七) Y. A. 塞义格:《阿拉伯经济:昔日表现与未来前景》第104~105,(牛津)1982年。
④ S. G. 哈贾尔主编:《中东:从过渡到发展》第47页,(莱登)1985年。
¹⁴ 申钟:《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初探》,《西亚非洲》1982年第6期。
¹⁵ [美]米歇尔·卡提斯:《宗教与中东政治》第6页,西方观察出版社,1981年。

(责任编辑 敬 军)